

二元结构与本土立场：俄罗斯地理空间演化视野下的文明断层线与乌克兰*

方 亮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俄罗斯地理空间演化历史的梳理，解释了东西方文明断层线的由来，以及因乌克兰被其贯穿而导致的动荡与撕裂。不同时代条件下具体地区归属于不同文明板块，近代以来族裔、语言逐步取代掌权者之间的个人效忠关系成为归属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使文明断层线稳定延续。这个进程在俄罗斯造成本土立场的崛起，成为帝国地理空间中心—边疆二元结构解体的主要原因。而解体造成文明断层线的动荡，在俄地理空间结构中具有中心—边疆双重身份的乌克兰因此而撕裂加剧。俄罗斯地理空间演化历史体现出身份认同与主观地理空间方案同步演化，后者进而影响客观地理空间的规律。俄国从18世纪的绝对君主专制转向19世纪君主专制与平民政治相融合，导致俄罗斯人身份认同在19世纪突出俄罗斯族群的本土立场。这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引发俄罗斯族群对帝国内异质空间和帝国外同质空间的追求，它们分别体现为“俄罗斯化”政策和“斯拉夫主义”政策。二者一方面为20世纪初的政权覆灭和帝国解体提供了解释，另一方面也共同为俄罗斯在20世纪末的再一次解体以及在21世纪初针对乌克兰的地缘政治追求提供了解释空间。

【关键词】 俄罗斯地理空间 本土立场 文明断层线 身份认同 二元结构 乌克兰危机

【作者简介】 方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普京进入第三个总统任期，俄罗斯政治进入新周期，在国家现代化进程未实现突破的背景下，国家外部进程“喧宾夺主”地压制内部进程，政治刚性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1950年前中共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1&ZD031）的阶段性成果。

和极端性明显加强，社会氛围和大众心理趋于紧张。俄罗斯的地缘空间成为普京施政重点，地缘政策地位显著提高，甚至压倒国家现代化进程，主导俄罗斯政治，让其体现出鲜明的“地缘政治主义”（геополитизм）^①特征。赋予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正当性的历史文明叙事在历史哲学意义上具有“向后看”的特征，使得俄罗斯与当今世界拉开距离。“俄罗斯世界”“历史俄罗斯”^②“历史公正”^③等概念层出不穷，让俄罗斯主流政治理念和政策实现了向历史地理空间的追溯。

为了理解和分析普京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属于同一民族的主张、对苏联加盟共和国体制和乌克兰在苏联时代“获赠”领土和人口的解说与批判^④、改变两国现有疆域和扩大俄罗斯地理空间的地缘政策^⑤，对俄罗斯进行历史地理学视角的梳理解析是一条可行的研究进路。它可以帮助厘清作为俄罗斯当下主流政治理念和地缘政策核心要素的民族身份认同的来龙去脉，解释普京的地缘政策何以强烈

① 俄罗斯学者尼古拉·科索拉波夫在 1995 年分析俄政治人物群体的话语、叙事时指出：“在政治意识舞台上登场并自信地占据支配地位的不是学说和理论，而是地缘政治理念，而且这种理念开始逐渐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他指出一种危险：政治人物们被“地缘政治主义意识形态”（идеология геополитизма）所吸引，“又开始追逐李森科主义，而非科学”。另一位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伊里因则将同一种现象定义为“地缘政治神秘主义”（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истика）。Цымбурский В. Л. Морфоло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и динами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истем XVIII – XX Веков. М.: Книжный мир, 2016. С. 22.

② “历史俄罗斯”概念并非普京首创，它最早出现于 1917 年之后俄罗斯侨民群体的创作中。由于当时俄罗斯帝国已经不存在，侨民作家们又不愿意使用“苏联”这个名称，便创造了这个概念，用来称呼俄罗斯，强调它的历史身份，隐含对苏联的贬抑。苏联解体后，维塔利·阿维里扬诺夫、谢尔盖·巴布林以及前俄罗斯文化部长、现任俄总统助理弗拉基米尔·梅津斯基等一批持捍卫东正教、强国、帝国立场的保守派作家、学者开始使用这个概念，用来主张俄罗斯的历史性存在，隐含着用历史指涉现实的色彩。普京在 2012 年的总统竞选文章《俄罗斯：民族问题》中首次使用了“历史俄罗斯”概念，“历史俄罗斯不是族群国家，也不是美国式的移民‘大熔炉’。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作为多民族国家出现并发展，在它内部不断进行着不同民族在家庭、友谊、工作层面的相互习惯、渗透、混合”，“我们是多民族社会，但是一个统一的民族”。Путин В. В.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https://www.ng.ru/politics/2012-01-23/1_national.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9 月 20 日。

③ 在 2015 年 4 月公映的电影《总统》中，普京称：“收回克里米亚不是因为我们想吞掉什么，也不是因为它在黑海地区的战略地位，而是因为历史公正的问题。”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назвал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рым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ю. <https://lenta.ru/news/2015/04/26/putincrim/>, 访问时间：2020 年 5 月 7 日。

④ 普京一直将苏联加盟共和国体制视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曾斥其为“定时炸弹”，指责列宁等苏联领导人。他也指责赫鲁晓夫将领土和人民“赠送”给乌克兰的做法。在 2022 年 2 月 22 日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的演说中，普京指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从苏联领导人手中获得了属于“历史俄罗斯”的大片土地和大批人民。Обращение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к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https://tass.ru/politika/13791435>, 访问时间：2022 年 3 月 5 日。

⑤ 2021 年 7 月普京发表题为《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的文章，强调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个民族”，属于同一个“历史和精神空间”。Путин В. В.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访问时间：2021 年 9 月 21 日。2022 年 2 月 22 日他在演说中表示，“对我们来说，乌克兰不仅是一个邻国，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Обращение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к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https://tass.ru/politika/13791435>, 访问时间：2022 年 3 月 5 日。

关注乌克兰。本文将以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的演变为线索，梳理俄罗斯地理空间的演化历史，分析俄罗斯与欧洲间文明断层线的由来，提出乌克兰的动荡源于它身处文明断层线及俄罗斯地理空间中心—边疆二元结构的关键位置。

一 东西文明断层线的由来

我们首先从“中心—边疆”视角分析俄罗斯地理空间核心地带的结构。城市、地区及海洋、河流、森林、草原是衡量它的基本单位，而地缘政治行为是分析空间结构变化的线索。

（一）基辅罗斯地理空间的“中心”与“边疆”

在基辅罗斯时代，罗斯被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在中间，两个贸易区的地理核心——拜占庭帝国和黑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通过第聂伯河、洛瓦季河、伊尔门湖、沃尔霍夫河、涅瓦河组成的水路连接，构成一条意义重大的贸易通道。罗斯通过它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获得铁、木材等商品，并将自己的兽皮、毛皮、蜂蜜、蜡、奴隶等销往拜占庭，从那里获得酒、丝绸、圣像、珠宝等制成品。北欧地区通过它参与到以拜占庭帝国为枢纽的东西方贸易中，它被《往年纪事》称为“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成为罗斯建国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拉芬斯伯格研究认为，当时罗斯参与欧洲贸易及东西方贸易的路线主要有三条：从波罗的海经伏尔加河至里海、从诺夫哥罗德至君士坦丁堡、从中欧城市雷根斯堡经基辅至中亚^①。其中第二条路线便是“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第一条路线在10世纪及其之前比第二条更加重要^②，但为罗斯带来国家体制的瓦良格人选择的是第二条路线^③，尽管二者都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起点。

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等学者支持的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贸易说”，基辅罗斯是

^①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Russian Economic and Marital Policy: An Initial Analysis of Correlations”, *Russian History*, 2007, Vol. 34 (1-4), p. 11.

^② 根据北欧学者伯吉特·索耶、皮特·索耶的研究，9~10世纪大量阿拉伯银币通过基辅罗斯及其他东欧地区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同期来自拜占庭帝国的货币却相对较少。Sawyer B., Sawyer P., *Medieval Scandinavia. From Conversion to Reformation, circa 800 - 15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146.

^③ 这是罗斯建国神话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罗斯建国的“海外王公说”——南下进入罗斯的瓦良格人带来秩序，帮助其建立国家。

在“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及其贸易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同时也定义了基辅罗斯的地理空间结构，克柳切夫斯基将其描述为：“大多数城市沿着‘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主要水路，沿着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形成一串长的锁链”^①。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以“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为树干，以该路线的支流和其他支线河道为枝干的树形结构。在“树干”上排列着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基辅、柳别奇等城市，在“枝干”上则是道加瓦河上的波洛茨克、普里皮亚季河上的图罗夫、杰斯纳河上的切尔尼戈夫、特鲁别日河上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等城市。上述城市，除柳别奇、图罗夫外，构成了克柳切夫斯基划分的 9 世纪下半叶罗斯的六个城市领区^②，这意味着上述空间结构涵盖了早期基辅罗斯地理空间，而基辅是这个空间的中心。克柳切夫斯基说：“基辅把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这条从希腊人到瓦良格人河道沿岸的许多罗斯商业城市连成了一条链”；“基辅是当时罗斯通商活动的汇集点，各地的商船都从沃尔霍夫河、道加瓦河、第聂伯河的上游及其支流驶向这个城市”^③。鲍里斯·雷巴科夫结合《往年纪事》中一份罗斯 7~8 世纪疆域名录总结出另一套空间结构，他认为当时的罗斯空间呈现为一个倒置的 T 字形：该结构的横轴主要为罗斯的森林草原地带^④，西起西布格河，东至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地区，纵轴从横轴中心往北延伸，涵盖普里皮亚季河流域，直至道加瓦河右岸的波洛茨克地区^⑤。雷巴科夫认为，横轴和纵轴覆盖的地带是罗斯各地一体化的核心地带，它的中心便是横纵轴相交的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该地区从南侧紧邻基辅。他指出，早在 6~7 世纪基辅就已经是罗斯地缘联合的中心。

相较于克柳切夫斯基提出的“锁链”结构，雷巴科夫提出的倒置 T 字形结构多出一道“横轴”，其重要意义由穿越基辅、坐落于森林草原地带上一条东西向贸易路线所体现。它既是拉芬斯伯格总结的第三条路线——从中欧城市雷根斯堡经基辅至中亚，也是从基辅出发沿特鲁别日河穿越佩列亚斯拉夫利连接“伏尔加—里海”贸易路线的一条道路。这条路线所穿行的区域只有中间一部分位于当时的罗斯地理空间内，克柳切夫斯基可能因此未将它纳入自己的空间模型。

①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24 页。

② 诺夫哥罗德区、波洛茨克区、斯摩棱斯克区、切尔尼戈夫区、佩列亚斯拉夫利区、基辅区。同上，第 134 页。

③ 同上，第 141 页。

④ 欧亚大陆一片狭长的东西走向的森林、草原的混合地带，从喀尔巴阡山东麓延伸到阿尔泰山，雷巴科夫所举的区域即为该地带在当时罗斯的分布区域。

⑤ Рыбаков Б. А.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и русские княжества XII—XIII вв. М., 1993. С. 88.

克柳切夫斯基和雷巴科夫为基辅罗斯地理空间划分出了“中心”与“边疆”。无论“锁链”还是倒置 T 字形，它们的共同点是，均把基辅视为罗斯地理空间的中心，当然它并非几何意义上的空间中心点。相应地，远离基辅的地区便是整个空间的“边疆”，它至少包括“锁链”和倒置 T 字形纵轴的另一端——诺夫哥罗德城市领区，以及倒置 T 字形横轴的两端——加利西亚—沃伦地区、顿涅茨河—顿河流域。此外，既不属于“锁链”也不属于倒置 T 字形，让基辅罗斯空间向东北延伸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地区显然也属于“边疆”之列。悖论在于，从整个基辅罗斯地理空间来看，作为“中心”的基辅实际上也有“边疆”身份，因为它同上述“边疆”一样，位于整个空间的边缘。基辅以南便是南俄草原，那里的游牧民族不断骚扰它和基辅罗斯的商路，它需要像一个边疆地区一样承担起边防任务。从贸易和边防角度看，一些边疆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与基辅非常类似，比如诺夫哥罗德。这些都为后来的空间结构转换埋下了伏笔。

（二）“断层线”与被三分的古罗斯地理空间

在王公内讧、与草原游牧民族的战争、“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贸易地位被取代等因素的影响下，基辅罗斯衰落并陷入分裂，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从 12 世纪中叶起几乎衰败为空城、荒野^①，这里的人口流向西面的西南罗斯、波兰，以及东北方向的伏尔加河上游、奥卡河地区，即以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地区为核心的东北罗斯。米哈伊尔·伊里因认为，此时罗斯各公国都阶段性地获得了独立，基辅失去了中心地位，其中一些公国可能成为未来罗斯新中心，因此罗斯地理空间的中心在这个时期与其自然意义上的中心重合，即中俄罗斯高地^②。该判断基于一个地理视角的分析，分析单位是涵盖或覆盖 15 条河流流域的 13 个公国或其他政治单位^③。伊里因提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几条河流——道加瓦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奥卡河、顿河的源头，中俄罗斯高地成了这一时期罗

①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第 277、279~280 页。

② 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一座南北长约 1 000 公里，东西宽约 500 公里的巨大丘陵。

③ 它们是第聂伯河上游流域的斯摩棱斯克公国、第聂伯河支流普里皮亚季河流域的图罗夫—平斯克公国、第聂伯河支流杰斯纳河流域的切尔尼戈夫公国、第聂伯河下游流域的基辅公国和佩列亚斯拉夫利公国、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流域的加里西亚公国、南布格河上游流域和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流域的罗斯王公们的突厥附庸——黑克洛布克人（Черные Клобуки）、西布格河的弗拉基米尔—沃伦公国、涅曼河上游流域和道加瓦河流域的波洛茨克公国、洛瓦季河和涅瓦河交汇地区的诺夫哥罗德公国、伏尔加河流域的罗斯托夫—苏兹达利公国、顿涅茨河流域的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公国、顿河流域的梁赞公国。Ильин М. В. Проблем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острова Россия” и контуры ег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1 – 1995 –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С. 42.

斯的中心，“它既联结又分隔出一个多面罗斯（многоликая Русь），无论从哪一面翻过它，都会的另一面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罗斯”^①。伊里因认为，基辅罗斯强大时，罗斯地理空间的标志是“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而当它陷于衰落和分裂，其标志变成了《伊戈尔远征记》中对中俄罗斯高地的称呼——“山岗”（шеломьянь）^②。相较于“锁链”和倒置 T 字形，“山岗”包括了基辅罗斯所有地区，在东西方向上从西布格河延伸至伏尔加河上游和顿河。

这是混乱分裂中的状态。罗斯其后又被蒙古鞑靼人入侵、统治，只剩下西南部的加里西亚—沃伦公国没有被直接统治，其王公达尼尔宣誓效忠金帐汗国后基本保住了公国的独立地位。但在达尼尔去世后，加里西亚—沃伦公国衰落并解体，加里西亚被波兰占据，沃伦归于立陶宛。在格季米纳斯父子的领导下，立陶宛于 14 世纪下半叶吞并了基辅、切尔尼戈夫等地区 and 斯摩棱斯克的大部分，并击退了蒙古人的入侵，其领土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占据了包括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罗斯半壁江山，早期基辅罗斯地理空间大部分落入了它的手中。在东正教都主教驻地更替^③、王朝延续、军政影响力和一系列明智政策和地理因素^④影响下，罗斯的中心转移到了莫斯科。从地理空间结构分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北罗斯是基辅罗斯狭长南北“锁链”式空间向东北的延伸，它的崛起为罗斯地理空间在南北纵深基础上增加了东西纵深。莫斯科从 14 世纪开始推进“罗斯统一”战略，到 16 世纪上半叶基本统一了除立陶宛占领地区外的罗斯土地，其中还包括在同立陶宛三次战争后夺得的斯摩棱斯克。罗斯地理空间至此被莫斯科、立陶宛两大公国从东西两个

① Там же. С. 43. 这里应当是指瓦尔代高地、斯摩棱斯克—莫斯科高地和中俄罗斯高地共同组成的丘陵地带，但伊里因只用中俄罗斯高地统称它们。

② 《伊戈尔远征记》中有一句话很著名：“О,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уже за шеломянем еси!”，它一般被译为：“哦，罗斯大地，你已在山岗之后!”。伊里因在这里只是借用“шеломьянь”一词，因为它在这句话里的含义接近“分水岭”。关于“шеломьянь”一词的含义和词源，不同学者作出过不同的解释，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它的词汇原型是“шеломя”，指“山岗”“山丘”等。在 13 世纪的南罗斯编年史《伊帕季耶夫编年史》中出现了“шоломя”一词，研究者们认为它就是后来的“шеломя”，并根据上下文判断其含义同样为“山岗”“山丘”。《伊戈尔远征记》是欧洲中世纪四大英雄史诗之一（其他三部是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而“哦，罗斯大地，你已在山岗之后!”这句话则是其中最源远流长的一句，表达了作者对罗斯大地的深沉情感，“шеломьянь”这个词也因此俄语中获得了特殊地位。这也是伊里因借用它来指代自己的地理模型的原因。

③ 原属于加里西亚—沃伦公国的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都主教驻节地的地位在 1325 年被莫斯科获得。

④ 军政影响力包括在摆脱蒙古鞑靼人统治的罗斯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明智政策至少包括与蒙古政权处理好关系，并获得替大汗征收罗斯各地贡赋的特权。地理因素指莫斯科位于数条重要河道交汇的贸易枢纽上，这个位置还帮助它承接了从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来的大量移民，它的周边地区则帮它抵御了外族入侵，比如诺夫哥罗德帮助抵挡住瑞典人、立陶宛人、条顿骑士团的进攻，而位于它东南的梁赞则首先承受了蒙古鞑靼人的破坏。

方向^①瓜分，中俄罗斯高地成为二者的共同边界。

罗斯此次被瓜分是俄罗斯历史的重要节点，因为它意味着东西方两大文明板块在罗斯土地上鼎足而立。早在12世纪罗曼公爵统一加里西亚—沃伦，并在不断征战中将影响力扩大至基辅时，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就曾试图赠予他一顶王冠，让其成为天主教世界的国王，但罗曼拒绝了。加里西亚—沃伦公国成为唯一“幸存”于蒙古鞑靼统治的公国时，其统治者达尼尔，即罗曼的儿子，曾于13世纪中叶靠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帮助进攻蒙古鞑靼人，并取得胜利。他选择接受教皇赐予的王冠，让自己不仅是东正教世界的王公，还成为天主教世界的国王。加里西亚—沃伦因此得罪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失去了拥有都主教驻节地的地位。加里西亚—沃伦公国同时感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世界的影响，浦洛基说：“蒙古人的入侵及在黑海草原上的长久存在迫使罗斯精英们首次面临一道选择题，选择由草原游牧民族、蒙古游牧民族和拜占庭基督教传统代表的东方还是选择承认罗马教皇神圣权威的中欧统治者所代表的西方。现代乌克兰领土上的这些基辅衰落后留下的精英们首次发现自己正身处欧洲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的断层线（fault line）上”^②。

“在立陶宛大公国事实上扩张至黑海后，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乃至更多的居民是罗斯人，扩张也很少带来社会变动：各个城镇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罗斯特征；罗斯的波雅尔和东正教会继续享有很高的地位及广泛的特权而且原有的罗斯城市、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立陶宛统治集团如饥似渴地接受了基辅罗斯的文化……俄语成为新国家的官方语言”^③，因此立陶宛大公国被历史学家定义为“立陶宛—罗斯国家”。这是历史的一个岔路口——如果立陶宛大公国就此融入东正教和罗斯人组成的东方世界^④，上述断层线可能将延伸于立陶宛和波兰之间。

但这没有发生。1385年立陶宛与波兰签署了克列沃协议，实现领土联合，一年后33岁的立陶宛大公亚盖洛迎娶了12岁的波兰女王雅德维加，获得波兰王位，并依照协议放弃东正教，皈依罗马天主教。这次历史性决定意味着断层线依然将划

① 实际位置更偏于东北和西南。

② Serhii Plokhy,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p. 57. “断层线”（fault line）本是一个地质概念，指地壳受力发生断裂时，断层面与地面的交线。其危机色彩和形象性让它被借以指代体系内蕴藏危机的脆弱之处。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年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用它指代世界史意义的文明体发生碰撞的地带。浦洛基在这里用它来描述加里西亚—沃伦公国位于两大文明板块分界线上的地理位置与主观感受。

③ [美]尼·梁赞诺夫斯基、马·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8版），杨焯、卿文辉、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④ 立陶宛曾于1368年、1370年两次包围莫斯科城，但未能将其攻下。否则，历史将被改写。

在波兰—立陶宛和罗斯之间^①，因为立陶宛自此将接受波兰宗教、文化的影响，实施波兰的制度，原罗斯西部空间的贵族和斯拉夫人也将同此命运。

在与立陶宛大公国形成东西分立局面后，莫斯科理论上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向东扩张，去继承金帐汗国疆域而放弃“罗斯统一”，不再追求西部空间。这又是一个历史岔路口。伊凡四世确实为俄罗斯打开了向西伯利亚、中亚扩张的大门，在“罗斯统一”尚未完成之际，他在 16 世纪下半叶攻下金帐汗国留下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在 1648 年乌克兰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第一次请求加入莫斯科大公国时，即位不久的费奥多尔沙皇予以拒绝，展示了莫斯科对向西部空间推动“罗斯统一”的谨慎态度。立陶宛和波兰曾试图统一古罗斯东部空间^②，但未获成功。17 世纪下半叶莫斯科通过接受左岸乌克兰^③和一系列战争、条约将部分西部空间纳入版图^④，展示了将“罗斯统一”战略执行到底的决心。这是一次历史性抉择，因为古罗斯西部空间已成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政治、文化断层线，莫斯科的“罗斯统一”战略则是占据这条断层线的尝试，这将成为日后多个世纪的地缘政治碰撞的导火索，为俄欧文明冲突提供舞台。

1654 年左岸乌克兰加入莫斯科大公国使这个区域的文明断层线开始清晰化。1667 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将第聂伯河确立为波兰—立陶宛和莫斯科大公国之间的界河。在俄罗斯和波兰各自宗教、文化影响的背景下，被第聂伯河分隔的两片疆域开始分属于东西方两个世界，这条界河也获得了文明板块断层线的历史形象。

1569 年，波兰、立陶宛的“克列沃联合”升级为“卢布林联合”，二者组成联合国家，波兰、立陶宛构成的二元地理空间结构将罗斯西部空间二元化为北部的白俄罗斯和南部的乌克兰。浦洛基认为，“乌克兰”这个名称随着这条分界线的确立开始出现，16 世纪 90 年代的一份地图使用了这个名称，用来标注第聂伯河右岸北至基辅南至卡涅夫的地理区域^⑤。但在宗教和文化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① 直到此时，历史也并非没有岔路口。在克列沃协议后，立陶宛仍相对独立于波兰，亚盖洛的表兄维托夫特继续通过征战扩张立陶宛的势力。他曾带领立陶宛波兰联军消灭条顿骑士团，但在 1399 年对蒙古人的关键战役中遭遇惨重失败。如果他能够取胜，那么立陶宛可能取得霸权地位，压制波兰和蒙古人的金帐汗国。

② 立陶宛人数次联合蒙古鞑靼人从东西两面夹击莫斯科大公国。在大混乱（Смута）中，波兰一度占据莫斯科，甚至取得莫斯科公国王位继承权。

③ 指第聂伯河左岸，也就是这条河的东面。

④ 1654 年乌克兰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带着军队、土地、城市归于莫斯科主权下。莫斯科通过 1667 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和 1686 年的《永久和平条约》获得基辅和斯摩棱斯克，并将第聂伯河确定为波兰和俄罗斯的界河。

⑤ Serhii Plokhy,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p. 72.

兰都开始像最早被波兰占据的加里西亚一样受到天主教、贵族民主、日耳曼式城市自治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东乌克兰加入莫斯科大公国后，与西乌克兰的差异逐渐加大，第聂伯河的断层线身份逐渐加强。

新地理结构也反映在俄罗斯人的地理认识中。在莫斯科中心叙事下，古罗斯西部空间被矮化为附属空间，其两个部分分别得名“小罗斯”（Малая Русь）和“白罗斯”（Белая Русь），莫斯科主导的地理空间成为“大罗斯”（Великая Русь）^①，古罗斯地理空间被分为三部分，对应着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

18世纪，“罗斯统一”战略已融入俄罗斯帝国的欧洲争霸战略。俄欧地缘政治在这个世纪集中于瓦季姆·齐姆布尔斯基^②所定义的“波罗的海—黑海冲突体系”（Балто – Черноморская конфликтная система）——瑞典、波兰、奥斯曼土耳其、多瑙河沿岸地区及巴尔干半岛等被波罗的海、黑海南北包夹的地区^③。他认为，这一体系将俄罗斯与欧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欧洲也通过它将俄罗斯隔绝于外。18世纪证明了这个概念的生命力：1694年俄土战争、1700~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1712年俄迁都圣彼得堡、1765年俄在南部地缘对抗前沿设立“新俄罗斯”（Новороссия）省、1768~1774年和1787~1792年的两次俄土战争及俄吞并克里米亚、1772~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这些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接连在“波罗的海—黑海体系”范围内发生。此外，尼基塔·潘宁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

① “大罗斯”“小罗斯”的用法首先出现于1305年东正教加里西亚教会获得独立都主教区地位时。当时它下辖6个教区，规模小于拥有12个教区的基辅都主教区（基辅主教区也是全俄都主教区，但在其都主教马克西姆去世后，君士坦丁堡教会决定将加里西亚都主教区提升为全俄都主教区），因此在教会中被称为“小罗斯”，而后者被称为“大罗斯”。这种用法经历漫长演化，获得了地理含义。从16世纪起，莫斯科治下的罗斯开始被称为“大罗斯”，作为对此的反应，以基辅为核心的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被称为“小罗斯”。奥列格·特鲁巴切夫认为这里的“大”指的是“新的，后出现的，范围更广的”，而“小”指“古老的，核心的，作为起源的”。Трубачев О. Н. В поисках единства. изд. третье, доп. М.: Наука, 2005. С. 86. 从16世纪末开始，波兰—立陶宛联邦占据的罗斯西部空间开始被称为“小罗斯”。而用来区分罗斯各地区的颜色命名体系是由12世纪的西方地理学家们发明的，他们将东北罗斯称为“白罗斯”，这个用法持续至17世纪。但在13世纪出现了一种将道加瓦河流域、第聂伯河上游流域，即大致现在的白俄罗斯地区，称为“白罗斯”的用法。从16世纪起这种用法后来居上，被广泛接受。由于莫斯科治下的东北罗斯当时也被称为“白罗斯”，所以15~17世纪的西方地理学家将波兰—立陶宛联邦占据的罗斯地区称为“黑罗斯”（Черная Русь）。当时也有学者将该地区称为“红罗斯”（Красная Русь），与“黑罗斯”混用。但在后来的演化中，这两套命名系统只剩下了“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即它们今日的词语形式及其在历史中所指代的大致地理范围。而16世纪的“大”“小”含义已经消失，被一种莫斯科中心叙事下的“大”“小”含义所取代。

② 这位被称为“俄罗斯亨廷顿”的地缘政治研究者格外重视俄罗斯与周边文明之间的不稳定地带，同亨廷顿意义的文明色彩更重的“断层线”相比，他主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定义这个地带。他用“лимитроф”（意为“缓冲国”、“缓冲地带”）这个词来称呼这类国家和地区。

③ Цымбурский В. Л. Морфоло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и динами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истем XVIII – XX веков. М.: Книжный мир, 2016. С. 10. 该名称指被两海从南北所夹的大片地带。

议建立的联合各北欧国家的“北方协约”（Северный аккорд）组织^①，尚未成形便被以消灭奥斯曼土耳其、重建一个拜占庭式的基督教帝国为目标的“希腊计划”（Гре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②取而代之，后者同样无疾而终，但它们都佐证了“波罗的海—黑海体系”的地位。尽管这个概念更强调地缘政治内涵，但它依然证明了亨廷顿意义的断层线所具有的紧张动荡特征。

“波罗的海—黑海体系”一度仍包括古罗斯空间，因为俄虽已占据了左岸乌克兰和基辅、斯摩棱斯克，战火还是烧到了那里^③。而在三次瓜分波兰后，俄正式占据了除加里西亚外的古罗斯西部空间，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几乎完成了“罗斯统一”战略。但俄对古罗斯空间的“收复”以及“波罗的海—黑海体系”基本上位于古罗斯空间以西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旧有的东西方文明断层线因此而被推向西方。在14~17世纪的历史中，断层线主要由宗教标准定义，随区域内王国和公国的相互征战、联盟和联姻所导致的宗教信仰转换而变化。但18世纪末已不是仅凭王公贵族的个人意志或宗教信仰就可以决定一块土地归属于某一文明板块的时代，起决定作用的是民众的语言、文化、宗教和身份认同。简言之，在新的时代，人才是决定一个空间文明身份的根本，所以文明断层线依然沿着第聂伯河“贯穿乌克兰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这条断层线也贯穿了俄罗斯西部边疆，为俄罗斯后来的地理空间演化留下悬念。被波兰、立陶宛占据长达四个世纪的乌克兰^④、白俄罗斯作为古罗斯西部空间“回到”俄罗斯地理空间后，将具有稳定性并与俄空间其他部分建立牢固联系，还是将像俄帝国后来扩张获得的土地那样充满动荡不安？

当从文明断层线的角度去审视俄罗斯地理空间时，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将至少拥有两条断层线。一条是贯穿俄紧邻天主教、新教欧洲的西部疆域的南北走向断层线，本节只介绍了它贯穿乌克兰的一部分，以及一条贯穿俄紧邻穆斯林世界的南部疆域的东西走向断层线。这两条文明断层线构成了俄罗斯地理空间最主要的与其他文明的接触区域。只有到了18、19世纪，土地上的人及其语言、族

① “北方协约”计划中的成员国是俄罗斯、普鲁士、瑞典、波兰，他们将在英国的支持下共同以法国、奥地利为假想敌。该计划将让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地缘角色，从东北方影响欧洲。但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决定与奥地利、普鲁士联手瓜分波兰，这是潘宁坚决反对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还对土耳其发动战争，这与奥地利利益一致，却与普鲁士和英国利益相悖。种种矛盾之下，“北方协约”无疾而终。

② [美]尼·梁赞诺夫斯基、[美]马·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8版），第258页。

③ 比如1676~1681年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土耳其对左岸乌克兰的进攻，以及大北方战争中的波尔塔瓦战役。

④ 主要指西乌克兰。

群、宗教才成为文明归属意义的决定性因素，这两条断层线才会凸显出它们作为不同文明板块接触、碰撞地带所具有的动荡特征以及决定历史走向的潜力。

二 中心—边疆二元结构因俄罗斯本土立场而解体

俄罗斯地理空间及其结构的演化非常典型地展示了其背后的权力逻辑，君主们将其个人意志及国家意识形态投射至地理空间中，对其进行扩张，或改变其结构、方向。但权力因素往往决定着地理空间的外部框架，在其内部，农民、城市平民决定着空间的命运，他们可能因为君主有限的治理能力和国家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的先天不足而对空间造成冲击，也可能因为身份认同的变化而通过平民政治影响国家政策。俄罗斯地理空间所具有的二元结构以及文明断层线便在这个背景下陷入动荡。

（一）农民移民及地理空间的萎缩、崩溃和重建

普斯科夫修士菲洛费伊在 1523 年和 1524 年间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提出“第三罗马”学说，强调莫斯科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中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该学说隐含世界性帝国的地理空间主张，并将莫斯科定义为其中心。但在 1564 年，瓦西里三世之子伊凡四世设立特辖制，将国家分为特辖区和普通区，让它们拥有各自的管理体制、警察体制。前者扩张至全国三分之一疆土，并拥有事实上的首都——距离后者的首都莫斯科 150 公里的亚历山德罗夫。莫斯科大公国的分裂状态持续到 1575 年才结束。通过特辖制，伊凡四世实现了对莫斯科大公国的空间切割，严重冲击了莫斯科的中心地位。

“第三罗马”学说服务于莫斯科大公国的崛起，及其“罗斯统一”和建立帝国的进程。1551 年，位于斯维亚加河汇入伏尔加河处的斯维亚日斯克（Свияжск）成为莫斯科在古罗斯地理空间外攫取的第一块土地，这被认为是俄罗斯建立帝国的起点^①。但该进程刚开启，就遭遇特辖制对帝国空间方案的破坏。这背后的权力逻辑非常清晰，伊凡四世要削弱波雅尔贵族对国家事务的控制^②，建立自己的绝对专制地位，为此牺牲了俄帝国空间。

^① Нольде Б. Э.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Пб. :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ый, 2013. С. 44, 150.

^② 按照留里克王朝旧制，波雅尔贵族拥有获得封地的权力，并有权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包括册立王储等。

莫斯科大公国地理空间的崩溃进而发生，其直接原因是特辖制给俄农业经济带来的灾难性打击。叠加天灾、王朝绝嗣、外敌入侵等因素，导致 1598 ~ 1613 年发生了俄历史上著名的“大混乱”。在 1601 ~ 1603 年的大饥荒中，被选为沙皇的戈都诺夫拿出大笔金钱发给饥饿的人们，让他们购买粮食^①。但发钱的举措只集中于城市，人们蜂拥而至，尤其莫斯科，这反而导致城市粮价进一步上涨，饥荒更加严重。民众大批饿死在城里和去城市的道路上。当时身处莫斯科的荷兰人伊萨克·马萨记录道，很多达官贵人、富人、寺院都储备了足够吃三四年的粮食，但他们囤积居奇，而戈都诺夫却没有打击这种行为^②。各地地主们把做完活计的农民赶走，因为他们相信还有用不完的免费劳动力可以使用，只需管饭而无需付工钱^③，这使得更多农民逃荒到城里。当戈都诺夫得知人们涌向城市，很多地区逐渐没有人烟，他下令停止发钱，饥荒因此更加严重，仅莫斯科便饿死了超过 12 万人^④。

尼古拉·斯坦科维奇曾把莫斯科依靠中心位置^⑤崛起的进程比喻为“从中心点发展为一个环”，而这场大饥荒逆转了这个过程。戈都诺夫的治理体系无法将资源输送至广大地区，各地农民也没有与当地形成牢固联系，这导致地理空间遭遇饥荒这类灾难时以人口覆盖范围向城市迅速收缩的方式崩溃。此外，数量庞大的农民逃荒至南方，有的成为哥萨克。在后来发生于第聂伯河和顿河流域的多次农民起义及支持伪德米特里^⑥的民众浪潮中，这些人成为主力。农民起义规模巨大，甚至地方政府也拒绝服从莫斯科。波兰趁机入侵导致斯摩棱斯克等西部领土沦陷，他们甚至占领莫斯科，取得沙皇王位继承权。“大混乱”展示了莫斯科大公国地理空间的脆弱。它空有外部形态，却没有有效运转的秩序。

早在基辅罗斯时代，各公国大公们相互订立协议，承诺不接受从其他公国迁

① 按照波克罗夫斯基的计算，当时粮价暴涨了 80 倍。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Кн. 1. М.: Мысль, 1966. С. 352.

② Исаак Масса. Краткое известие о Московии в начале XVII в.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7. С. 60-61.

③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Кн. 1. М.: Мысль, 1966. С. 352.

④ Маржерет Ж. Состоя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жества Московии.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7. С. 159.

⑤ 莫斯科虽然位于整个古罗斯地理空间的东北地区，但在基辅衰落后，它在新的罗斯地理空间中位于中心位置，或者也可以说，它位于大俄罗斯地理空间的中心位置。几个主要的公国环绕着它，诺夫哥罗德为其阻挡来自西北的外敌入侵，梁赞则为其吸收鞑靼人从东方入侵时的第一波冲击。

⑥ 一位假借神秘死亡的伊凡四世小儿子德米特里之名现身的年轻人，他率领哥萨克和波兰士兵攻入莫斯科大公国，获得民众广泛支持，并最终占据了莫斯科。

移来的农民。15世纪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在与波兰国王卡齐米尔四世的协议中规定了对方送交逃亡农民的条件^①。“大混乱”中农民大规模逃荒、起义、成为哥萨克并非偶然，这种现象从16世纪中期就开始频繁出现。其原因是各级封建主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愈发严重，农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劳动和赋税，再加上南方、东南方、东方大片地域得到开辟，于是大批逃离，到新疆域中重新生活。

“大混乱”使社会各阶层展现出强烈内聚力，让俄地理空间得到恢复。“大混乱”后，沙皇政府着手解决农民未被束缚在土地上的问题。1607年颁布“15年追捕权限令”来替代1597年的“5年追捕权限令”，后者规定1592年前逃亡在外的农民必须携带妻子儿女及其财产回到原领地，其现主人有义务将其送回，以及对私藏逃亡农民者施以罚款或其他惩罚的措施。1649年新法律规定农民不论逃亡多久，都必须返回，永世不得迁移。封建主获得了随意处置其领地上农民的权力。至此，农奴制正式建立起来，农奴被禁锢在土地上^②。根据鲍里斯·米罗诺夫的统计，在1678~1915年的237年中，俄国内部移民总数约为1280万人，其中1678~1858年间处于农奴制束缚下约470万移民，而在农奴制废除后的1858~1915年期间，这个数字约为810万^③。农民被束缚，意味着国家地理空间得到稳固。

（二）二元帝国结构的诞生

俄罗斯地理空间演化史的主要矛盾是沙皇的扩张、切割、设计与民众出于自身利益或身份认同自主改变国家空间进程间的矛盾。伊凡四世的特辖制与民众在“大混乱”中的内部移民潮是这对矛盾的最初体现。在18~19世纪，它再次上演，其后果更加严重，运行机理更加复杂。

1703年彼得一世开始修建圣彼得堡，并于9年后迁都于此，它与莫斯科构成政治和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双中心。这是继特辖制后君主权力对俄地理空间的又一次双中心改革。二城地位有本质差异。拿破仑入侵俄国时说：“如果攻下基辅，我就抓住了俄罗斯脚，如果拿下圣彼得堡，我就摁住了它的头，如果占领莫斯科，我就击溃了它的核心”^④，这是准确的概括。作为“核心”的莫斯科承受了

^① Черепнин Л. В.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 223.

^②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③ [俄]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治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④ Орлик О. В. Гроза двенадцатого года. М.: Наука, 1987. С. 26.

彼得一世执政前大多数的民众起义、暴动。1771 年肆虐莫斯科的鼠疫首先在南部港口爆发，然后直接传播至莫斯科，并从那里传向各地，而非从南向北逐地传播^①。彼得迁都圣彼得堡的同时，将许多旧机构留在莫斯科，让它继续拥有“人民首都”称号。在俄罗斯人的认识中还存在着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心脏地带”（сердце России）。1837 年亚历山大二世以皇储身份在国内旅行，他从圣彼得堡出发来到特维尔后，其父尼古拉一世写信给他说：“从现在开始你才身处俄罗斯心脏地带”^②，显然，作为首都的圣彼得堡并不在此范围内。

在国家中心之外另设首都，这使得首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内政。比如，圣彼得堡在 1771 年莫斯科发生鼠疫时基本未受波及。彼得一世的这次地理空间改革起到了与特辖制改革类似的效果，它们均让君主超然于内政，让他们或拥有更加稳固的地位，或专注于某一领域事务。伊凡四世用特辖制来建立绝对君主专制，彼得一世则把地缘政治事务单列出来，将其赋予圣彼得堡，令其成为地缘政治意义的俄罗斯中心。这解释了拿破仑为何将圣彼得堡比喻为俄罗斯的“头”。双中心设置具有古老传统，并非源自伊凡四世。莫斯科获得为金帐汗国高层收取全罗斯贡赋职能后，成为金帐汗国下一个次级中心，从而获得崛起机会，金帐汗国首都萨莱构成一级中心。伊凡四世和彼得一世的双中心设置，均让莫斯科成为次级中心，让自己居于一级中心。俄罗斯帝国也因此呈现为由双中心构成的二元结构。

18 世纪，俄以帝国身份参与欧洲争霸，正式进入对外扩张时期^③。一方面，其向北直到北冰洋、向东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向东南对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具有明显的殖民色彩，因为那里缺少强大政治实体和先进文明；另一方面，其向西北对波罗的海地区、向西对中欧乃至西欧、向西南对多瑙河地区和巴尔干地区、向南对黑海地区的扩张，直接与欧洲诸强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相撞，相较于扩大疆域更突出以主导欧洲政治为目标的争霸活动。二元化的地缘政策要求二元化的地理空间结构。1736 年，瓦西里·塔季谢夫确定欧洲东部边界为乌拉尔山脉，这使

①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А. Т. Болотова // Столетье безумно и мудро. Век XVIII. М.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6. С. 425.

② Венчание с Россией; переписка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с императором Николаем I, 1837 год // Под ред. Захаровой Л. Г., Тютюник Л. И.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9. С. 130.

③ 这里将超出古罗斯地理空间的扩大疆域行为视为扩张，在这个意义上，莫斯科公国早在 16 世纪攻取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并进入西伯利亚时就已经开始了扩张活动。

得俄罗斯地理空间被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部分，包括古罗斯地理空间在内的俄罗斯历史的主要发生空间被确立进欧洲部分。这巩固了彼得一世为俄罗斯确立的欧洲身份认同，为俄帝国以欧洲国家身份经略欧洲提供了地理依据。该方案的欧亚二元结构与俄罗斯在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宗主国—殖民地政治结构几乎同构，为俄殖民亚洲提供了基于欧洲文明优越叙事的“合法性”^①。

塔季谢夫的欧亚二元结构复合了宗主国—殖民地政治结构，通过文明优越观念制造了一种二元身份结构，即俄罗斯族与异族的二元结构。这个结构落实于地理空间，构成中心地带和边疆地带的二元结构。边疆地带是在语言、族群、宗教意义上区别于俄罗斯人构成的核心地带的异质空间。它包括，由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作为统治精英，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作为被统治阶层的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各省；受波兰宗教、文化影响的立陶宛、白俄罗斯、西乌克兰；以罗曼语族的摩尔达维亚人为主体的比萨拉比亚；由分别信奉伊斯兰教、东正教、景教、基督教亚美尼亚教会、犹太教的 50 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大小的埃米尔酋长国、王国、公国、汗国所呈现的高加索地区；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巴什基尔人为主体的克里米亚、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南乌拉尔地区；以俄罗斯移民为主但辅之以许多游牧、渔猎民族的西伯利亚；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以及波兰、芬兰。它们均系俄罗斯从 1551 年攫取第一块古罗斯地理空间外土地后开始的帝国扩张进程的产物，而中心地带便是古罗斯地理空间，它被边疆地带包围。结合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双中心二元结构，圣彼得堡可以被视为边疆地带中心，而莫斯科构成中心地带中心。沙皇政权通过领土扩张和对国家地理空间的一系列二元化设计确立了兼具地理意义和身份认同意义的中心地带—边疆地带二元地理结构。

（三）俄罗斯本土立场的崛起

俄罗斯民族觉醒发生于 19 世纪上半叶，但其先声在 18 世纪即已出现，比如安娜女皇统治期间俄宫廷内反对她从国外带来宠臣和情人的俄罗斯势力，后来发展成名为“俄罗斯党”（Русская партия）的宫廷政治集团。罗蒙诺索夫等学者反对俄宫廷支持的德裔历史学家们根据“海外王公”传说提出的关于俄罗斯民

^① 这种叙事往往体现为“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有义务控制落后民族，并给他们带来秩序”。〔美〕尼·梁赞诺夫斯基、马·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 8 版），第 368 页。

族起源的“诺曼起源论”，提出俄罗斯民族的本土起源说^①。1812 年卫国战争爆发时，来自苏格兰的将领巴克莱·德·托利遭到“俄罗斯党”及公众和士兵的反对，亚历山大一世不得不用库图佐夫将其取而代之，尽管他早在 1807 年就提出了后来让俄国在卫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军事战略^②。

这是来自俄罗斯本土的立场，正如卡拉姆津 1811 年在《古代和近代俄国政治和民事关系札记》中所称，“我们成了世界公民，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不再是俄罗斯公民，这是彼得的错”^③，本土立场起源于对彼得一世西化改革的反动。它萃取自改革前的宗教世界观，借用俄罗斯哲学的宗教主题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寻根”式挖掘，被津科夫斯基理解为“一场在宗教中热切追寻一切复杂苦难生活问题答案的创造性运动”^④。西方派领袖恰达耶夫为俄罗斯哲学确立宗教哲学回归主题，斯拉夫派提出村社学说和“聚合性”学说，奠定俄罗斯文化特殊性和优越论，为本土立场注入“本体”。丹尼列夫斯基于 1869 年在《俄罗斯与欧洲：论斯拉夫世界对日耳曼—罗曼世界的文化和政治态度》一书中提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将俄罗斯文明特殊性和优越性用地域文明理论形式加以固定，让其从根本上与西方文明切断联系。

自法国大革命起，平民政治崛起成为欧洲各国普遍的政治现实。1812 年卫国战争作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战争成为平民政治的先声。通过知识分子传播及平民政治动员，本土立场“下沉”至尚未西化的中下阶层中。卡拉姆津撰写的《俄罗斯国家史》被普希金评价为“发现了古代俄罗斯，就像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⑤，出版后立即引起阅读热潮。在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等等创作门类中，表现俄罗斯民族生活的作品在这个世纪层出不穷，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

① 德裔历史学家赫拉德·米勒、戈利布·拜尔运用词源学、系谱学方法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资料，对俄最早的编年史、东正教教士涅斯托尔于 12 世纪撰写的《往年纪事》中记载的“海外王公”传说（瓦良格人应邀来到斯拉夫人部落称王，建立秩序）进行学术化改造，提出“诺曼起源说”。代表俄罗斯本土立场的罗蒙诺索夫反对该说，著书立说提出“反诺曼起源说”，指出传说中的瓦良格人实际上是斯拉夫人的一支，所以当时斯拉夫人并没有邀请异族人来自己的土地上称王，而是邀请了本族人。

② 让法军进入俄心脏地带，让其分散驻扎，延长战线，然后用一场总攻战歼灭之。〔俄〕阿·尼·阿尔汉格尔斯基：《亚历山大一世》，刘敦健译，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1~152 页。

③ Карамзин Н. М. Записка о древней и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в е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ях. М.: Наука, 1991. С. 35.

④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 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Т. 1. Париж: YMCA – PRESS, 1948. С. 94.

⑤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11.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49. С. 57.

在《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①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彼得·基列耶夫斯基等民俗学者到民间采风，搜集整理民歌、民间创作。这些意味着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俄罗斯代表性群体开始“下沉”。与此同时，执政精英集团开始内部分化，体现为波兰获得宪法、十二月党人起义和斯佩兰斯基改革等。这迫使俄国沙皇也要像欧洲皇帝们那样将民族和人民纳入政治叙事，强调权力的人民基础。俄语中除了开始出现“俄罗斯灵魂”（русская душа）、“俄罗斯理念”（русская идея）这些本土概念，也增加了译自法语的“民族性”（народность）概念^②。1832年12月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这个三位一体概念组合，将时代产物“民族性”列入其中，并在沙皇首肯后多次使用它，赋予其官方意识形态地位。“民族性”是区别于沙皇、贵族及其西方文化的蕴藏于俄国普罗大众中的抽象特性，它的出现标志着俄执政精英与知识精英同步地在平民政治崛起背景下接受俄罗斯本土立场。

（四）中心—边疆二元结构的解体

巴维尔·米留科夫曾对执政精英和知识精英围绕本土立场的结合作出总结：“宣扬民族主义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理想的基础上开始与俄国政府结成联盟。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政府原本倾向于接受新吞并国家的民族文化……但是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个态度逐渐改变了。”^③这展示了本土立场对俄罗斯中心地带—边疆地带二元地理结构的冲击，以及对俄罗斯族—异族身份认同二元结构的冲击。

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异族身份认同问题就开始引起关注。女皇在1764年写道：“小俄罗斯、立窝尼亚、芬兰都是拥有确定特殊待遇的省份，我们应以尽可能和缓的方式，将这些省份和斯摩棱斯克俄罗斯化，以免它们一直像狼一样渴望回到森林”^④，为此她在第一次瓜分波兰后要求所有原波兰各省的省长用俄语书写文书，同时她还加强了乌克兰境内的农奴制。但女皇提出的“俄罗斯化”

^① [英]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曾小楚、郭丹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② 该词由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于1819年译自法语的“nationalité”。它在汉语中有多种译法，“人民性”“国民性”“民族性”等等，本文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性”，其最大影响产生于俄罗斯民族的身份认同层面，故采用“民族性”这种译法。

^③ Милуков П. Н.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в России). Берлин: Свободная Россия, 1925. С. 158 – 159.

^④ Serhii Plokhy,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p. 134.

问题将对俄罗斯帝国地理空间造成冲击，因为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的本质在于多族群共存于统一地理空间内。1908 年斯托雷平在给波罗的海东岸各省临时总督亚历山大·梅列尔-扎科梅尔斯基的信中对此作了总结：“我完全同意尊敬的阁下，俄罗斯政府从来没有对生活在国家境内的各民族实施去民族化政策。帝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在兼并这些异族土地时，俄国君主们为了保护每个民族的习惯生活方式，总是追求让当地的法律关系保持不变，同时给予归附民族特定人群以跟俄罗斯阶层一样的特权。”^①

当被吞并民族得到尊重特殊性的待遇，并获得自治、特权地位时，中央空间和边疆空间的精英之间便获得固定的互动模式，帝国空间扩张获得制度性解决方案，帝国被整合为一个包容了各类异质空间的统一社会—政治有机体，帝国的中心地带—边疆地带二元地理结构也得到维系。在实践中，这体现为被吞并民族与沙皇之间的契约。1654 年阿列克谢沙皇将乌克兰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及其军队、土地、城市纳入莫斯科主权下时，给予哥萨克较多的自治权，让他们几乎成为“国中之国”。彼得一世 1721 年打赢北方战争，通过《尼斯塔特条约》获得波罗的海东岸的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他给了当地人以“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特权”（Остзейские привилегии），保留他们在瑞典统治时期的城市特权和各种自治形式，并归还地主们被瑞典统治者剥夺的土地。那里的贵族保留了宗教和语言自由，并得到除军职外的政府机关任职权利。穆斯林是俄帝国数量最大的非东正教臣民，但自彼得一世以后的历任沙皇都不重视这个群体，给他们立下包括禁止新建清真寺在内的诸多限制，还积极进行反伊斯兰教宣传。但在巴什基尔人参与了普加乔夫起义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773 年 4 月 8 日，在吞并克里米亚诏书中宣布了新的穆斯林政策：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伏尔加河地区鞑靼人的贵族群体均获得与俄罗斯贵族同等的权利，俄将设立数个伊斯兰宗教中心来专门处理穆斯林事务，穆斯林群体将在那里使用沙里亚法。亚历山大一世为了实现宪政理想，1809 年宣布承认芬兰宪法，1815 年赋予波兰以宪法，1817 年在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各省废除农奴制，从而实现“一国三制”^②。

俄罗斯民族在 19 世纪才正式迎来民族觉醒，而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帝国地理框架已经在历代沙皇的带领下建立起来。因此帝国并不是俄罗斯民族的选

^① Дякин В. 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СПб, ЛИСС. 1998. С. 245.

^② 俄罗斯没有宪法，没有废除农奴制；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各省废除农奴制；波兰、芬兰拥有宪法。

择，而是历代沙皇及其贵族阶层决策的结果。所以当俄罗斯人实现觉醒，本土立场被建立起来，上述政策便开始面临被逆转的前景，“俄罗斯化”政策将大行其道。1830年和1863年的波兰起义席卷几乎所有被俄罗斯瓜分来的前波兰领土，充分展示了俄西部边疆作为异质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身份：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均深受天主教和波兰贵族文化影响，占人口6%的波兰少数族裔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那里有大量天主教徒和说波兰语的民众。这些让俄政府开始警惕在俄国国内出现“波兰殖民地”的可能。为此，俄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弱化天主教会的地位、压制波兰文化传播、限制波兰人拥有地产^①。“波兰”甚至不再是这片土地的官方名称，它被改成了“维斯瓦河畔边疆区”（Привислинский край）。1839年在俄政府的安排下乌克兰联合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统一，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约1600个教区内的150多万名信徒改宗东正教。俄语教育在这些地区得到大力推进，这方面的进展被称为“西俄罗斯的复兴”^②。在乌克兰，乌克兰语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遭到禁止，帝国内政部长和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先后颁布密令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及进口乌克兰语出版物，还禁止了乌克兰语的戏剧、歌曲创作。1867年，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各省的政府公文语言被从德语改成了俄语。1877年，这里的地方行政改革降低了德裔人口在政府中的影响力。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高加索，那里进行了地方行政、司法改革，以便与帝国其他地区统一，阿布哈兹等地自治地位被取消，俄语在行政和教育中得到大力推行。在大批受洗鞑靼人^③脱离东正教及其他事件后，俄罗斯人对帝国南部边疆穆斯林群体愈发追求基于伊斯兰教的身份认同极为忧虑。因此，俄政府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加强东正教在穆斯林聚居地区的传教活动，比如1867年在喀山成立圣徒古里兄弟会（Казанское братство святителя Гурия）^④。在伏尔加河—卡马河地区，政府开始对当地已经受洗的少数民族进行俄语教育，推行“伊尔明斯基教育体系”^⑤。1874年曾通过将穆斯林宗教学校转归人民教育部管理的法律，为了不

^① Комзолова. А. А. Политика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м крае в эпоху Великих реформ. М.: Наука, 2005. С. 338-341.

^② Миловидов А. И. Заслуги графа М. Н. Муравьева дл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м крае. Харьков.: тип. Губ. правил, 1900. С. 3-4.

^③ 受洗鞑靼人（кряшены），16、17、18世纪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形成的接受东正教信仰的鞑靼人。根据1926年人口普查，其人口超过10万。到2002年普查之际，其人口已经超过20万。

^④ 圣徒古里，俄东正教圣徒之一，喀山、斯维雅日斯克地区第一位东正教大主教。

^⑤ 尼古拉·伊尔明斯基，俄罗斯东方学家，他认为让异族摆脱非东正教信仰影响的最有效手段是中学教育，为此，他提出在穆斯林集中地区开办新的中学教育体系。

激起穆斯林反对，该法未得到实施，但实施了禁止奥伦堡宗教大会（Оренбургское духовное собрание）^① 干预除鞑靼人事务外的草原总督区^②事务的决定。该政策基于当时沙皇政府对鞑靼人和哈萨克人的判断，前者被认为是在后者中施加伊斯兰教影响力的主力。尼古拉·伊尔明斯基认为，只要切断这种影响，哈萨克人就可以改信东正教。奥伦堡总督尼古拉·克雷热阿诺夫斯基如此解释这些政策：“信仰的多元对人民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有害影响”，所以应当“削弱……邪恶之源，也就是信仰的多元”，政府的政策应当是对俄罗斯内陆民族的“穆斯林生活方式进行逐步削弱，因为它在本质上与国家 and 真正的文明利益相悖”^③。

至此，帝国对国内异族的接纳、宽容已丧失殆尽，俄罗斯本土立场基本已经转化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其最极端的表现是在各类政党、组织群起，罢工、骚乱泛滥的背景下持续约半个世纪的排犹浪潮^④，以及 1915 年发生于莫斯科的排德事件^⑤。沙俄政权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展开由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衍生的斯拉夫主义地缘政策，并最终在一战中覆灭，它留下的帝国因俄罗斯化政策在超过半个世纪时间里的持续破坏而按照中心地带—边疆地带的分界线解体。1917 年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宣布独立，1918 年，爱沙尼亚、乌克兰、波兰、外高加索联邦宣布独立。1918 年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规定，俄将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和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放弃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地区，并承认乌克兰、芬兰为独立国家。新成立的国家还包括克里米亚鞑靼共和国、巴什基尔、吉尔吉斯、浩罕共和国、布哈拉酋长国和希瓦汗国。

三 解体中的文明断层线：乌克兰的特殊地位

这次解体基本沿着本文划定的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两条断层线发生，这说明

① 俄当时最重要的穆斯林事务机构。

② 1882 年设立的行政单位，包括西西伯利亚南部和中亚地区。

③ Дякин В. 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СПб. : ЛИСС, 1998. С. 20.

④ 规模较大的俄民众自发排斥、打击犹太人风潮从 1881 年开始，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俄国国内战争期间，造成大量犹太人伤亡和财产损失。1905 年俄国排犹达到高潮，仅在 10 月 17 ~ 29 日，就有 660 座城镇爆发排犹事件。这个月的排犹风潮造成超过 800 名犹太人死亡，仅敖德萨一地就超过 400 人。

⑤ 当年 5 月 26 ~ 29 日莫斯科民众以打击国内破坏者的名义对德裔和德国民众实施群体暴力攻击，共造成 113 名德籍、奥籍人士死亡，以及 489 名德国姓氏的俄籍人士死亡。

它们与中心地带—边疆地带的分界线十分接近。此外，在这次解体中脱离帝国的地区中只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属于古罗斯地理空间，这既证明“南北走向断层线贯穿俄罗斯古罗斯地理空间”，也提出一个追问：在中心地带—边疆地带二元地理结构中，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属于中心地带还是边疆地带？这呼应本文提出的悬念——被波兰、立陶宛占据长达四个世纪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作为古罗斯西部空间“回到”俄罗斯地理空间后将具有稳定性和与俄空间其他部分的牢固联系，还是将像俄帝国后来扩张获得的土地那样充满动荡不安？

实际上，二者具有中心地带和边疆地带的双重身份。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署仅半年后，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德国战败投降后将其废除。经过俄国内战，除芬兰、比萨拉比亚、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包括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波兰外，布尔什维克政府恢复了原先的俄罗斯地理空间。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首批成员国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①、外高加索联邦。而当1991年苏联解体时，决定性地开启解体进程的别洛韦日协议的参与方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也就是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苏联的成立和解体过程中都是核心参与者，这从侧面展示了二者的中心—边疆双重身份。

二者的双重身份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的定义。在20世纪前，乌克兰一直被奥地利、奥斯曼土耳其、俄罗斯三个帝国，以及或作为体制性压制者或作为其他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竞争者的波兰^②所包围，历代沙皇对异族的怀柔政策使得俄帝国成为它相对理想的选择。乌克兰地理空间在历史中主要处于俄帝国内，其历史也主要发生于那里，它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主要在那里实现。乌克兰与俄罗斯因此具有多重联系，除了传统的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叙事以及斯拉夫兄弟国家叙事，还有现实利益联系。历史叙事具有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影响力，但在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往往是现实利益。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就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联盟条约和可能的替代性方案进行会谈时，无论乌克兰总理福金如何谈论三个民族的血缘联系、兄弟同胞同根情义，克拉夫丘克都不为所动，他坚持乌克兰刚刚在公投中确立的独立道路。但当福金开始谈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时，他

^① 不包括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② 在波兰王国、波兰立陶宛联合国家时期，波兰曾先后在制度上压制乌克兰或其加里西亚、西乌克兰等地区。在奥地利、奥匈帝国内部，波兰人成为乌克兰人的竞争者。

才表示：“也许，我们确实不该分开。”^①而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的地位一直非常重要。在 1654 年获得左岸乌克兰之前，俄罗斯面对欧洲基本处于守势，瑞典和波兰在“大混乱”时期侵俄是典型体现。除了不成功的立窝尼亚战争，俄基本没有参与到欧洲争霸中。但在获得左岸乌克兰之后，俄开始与波兰立陶宛联合国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地利帝国产生直接的地缘政治关系，这导致后来的一系列战争，标志着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层面正式“西进”，参与欧洲争霸。乌克兰是比圣彼得堡更加重要的通向欧洲地缘政治的通道。

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在俄罗斯中心地带—边疆地带二元地理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俄罗斯帝国解体时，乌克兰被视为俄罗斯不可失去的一部分。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当时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最重要的领导人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②领导一批乌克兰政治、文化人士在基辅成立了“中央拉达”^③。随着工人、农民、士兵、少数族裔不断向它派出代表，其代表性逐渐加强，直至成为当时乌克兰的最高权力机构。它通过执行机构“小拉达”提出了内容广泛的乌克兰自治方案，包括拥有军队、各级教育体系乌克兰化、作为受害民族参加一战战后和平会议等，并选出政府内阁——总书记处。俄临时政府的反应是呼吁“兄弟的乌克兰人民”不要“因为不谨慎而踏上颠覆自由俄罗斯力量的道路”^④。6 月 3 日，临时政府全体成员一致驳回了乌克兰的要求。但中央拉达不为所动，通过发布乌尼维尔萨尔（Universal）^⑤的形式单方面宣布自治。临时政府当时在一战战场上面临巨大压力，被迫派出代表与乌方谈判。7 月 2 日，临时政府代表团承诺乌克兰将于日后享有自治权，并自作主张将俄西南部几个地区划给了乌克兰。此举在临时政府内部引发地震，来自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们全体退出，这成为“七月事件”^⑥的导火索之一。俄在失去芬兰、波兰、波罗的海东岸地区时，国内没有出现这样的震动。当时的立宪民主党成员伊万·佩特鲁恩科维奇写道：

① [美]沙希利·浦洛基：《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第 281 页。

② 作为历史学家的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俄语名译为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曾撰写了一部乌克兰史，讲述了区别于俄罗斯史观框架下的乌克兰史的另一套乌克兰历史叙事，从学术上为乌克兰的独立奠定了基础。他积极地为成立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党奔走，致力于乌克兰的自治和独立。

③ “拉达”在乌克兰语中为“议会”之意。

④ [美]保罗·库比塞克：《乌克兰史》，颜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2 页。

⑤ 哥萨克盖特曼传统的“政令”。

⑥ 7 月 17 日，在前方战事不利，军民反战情绪强烈，以及乌克兰自治导致临时政府内部动荡等因素刺激下，彼得格勒上万名士兵、工人走上街头，要求苏维埃立即夺取权力，喊出了著名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以维护秩序为名向示威人群开枪，造成 400 多人伤亡。

“从俄罗斯被肢解到她被消灭只有一步之遥”^①。当时担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立宪民主党领袖巴维尔·米留科夫 1939 年评价道：“两个成熟的果实滚到了德国人脚边，布尔什维克化的俄罗斯、独立的乌克兰”^②。

苏联解体的历史更真实地解释了乌克兰的特殊地位。1991 年戈尔巴乔夫为了挽救苏联提出的联盟条约事实上是被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否决的，因为 12 月 7 日在他作出“乌克兰人不想把一个枷锁换成另一个枷锁”^③的表态后，原本还在劝说他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只能宣布，乌克兰不签，那么俄罗斯也不会签，转而寻求实现替代方案——三个斯拉夫国家的某种联合体。他向美国方面解释称，如果联盟中没有乌克兰，那么俄罗斯就会被各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压倒^④。

从地理位置和追求独立的历史看，乌克兰毫无疑问属于中心—边疆二元地理结构中的边疆地带，作为“中心”的俄罗斯，其规模与综合实力大大强于乌克兰。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简单地由规模和实力决定，叶利钦的这番解释道出了俄罗斯面对乌克兰时的无奈乃至焦虑。这来自俄罗斯的欧洲身份认同，它需要与欧洲的地理联结，这决定了它离不开乌克兰。同样因为欧洲身份认同，叶利钦解释的原因也使得俄罗斯离不开乌克兰。相较而言，乌克兰的选择空间反倒比俄罗斯更大，地理位置让它拥有选择西方的机会，这反而会加重俄罗斯的焦虑感。另一方面，乌克兰的规模、实力、位置决定了它是整个俄罗斯地理空间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单位，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将影响这个空间内除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外其他单位的选择。

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乌克兰的中心—边疆双重身份。白俄罗斯也具有同样的双重身份，但它的重要程度不及乌克兰，也无法像乌克兰那样体现这个身份的撕裂感。这个双重身份，加上身处东西文明断层线的地理位置，乌克兰在俄罗斯地理空间的演化进程中，尤其在其解体进程中必将发生比其他地区更加剧烈的动荡和撕裂。

^① Архив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Ф. 518. Оп. 3. Д. 1261. И. И. Петрункевич В. И. Вернадскому. Гаспра, 14 июля 1917г. Л. 18 об. Цит. по: С. Брейяр. Партия кадетов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05 – 1917). <http://www.hist.msu.ru/Labs/UkrBel/brejar.htm>,访问时间: 2022 年 11 月 16 日。

^② Милоков П. Н. Тактика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Последние новости, 19. 03. 1939. С. 2. Цит. по: С. Брейяр. Партия кадетов 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05 – 1917). <http://www.hist.msu.ru/Labs/UkrBel/brejar.htm>,访问时间: 2022 年 11 月 16 日。

^③ [美] 沙希利·浦洛基:《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第 280 页。

^④ Plokyh Serhii,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p. 322.

结 论

本文实际上以乌克兰为逻辑起点，从它的特殊位置和身处文明断层线的位置出发，溯及整个俄罗斯地理空间的演化历史以及两条文明断层线与俄罗斯地理空间中心地带—边疆地带二元结构的关系。但在叙述时我们采用了倒叙方式，从大空间、大断层线讲起，然后总结大空间地理结构及其与断层线的关系，最后落脚到乌克兰的地位和位置。这样安排的原因是我们将乌克兰问题的由来视为一个让俄罗斯多层次历史脉络汇集在一起的关键议题，解释乌克兰问题便是对俄罗斯历史进行多层次梳理的过程。因此将乌克兰问题放到结论部分更符合思考逻辑顺序。

本文将俄罗斯本土立场的崛起视为俄罗斯地理空间解体^①及乌克兰陷于动荡的最大原因和直接原因。它很自然的一个逻辑延伸是，眼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是否依然因为俄本土立场的伸张？笔者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这个问题属于现实政治，我们将另文阐述。此外，乌克兰是否已经因为俄罗斯的政策而跨越了东西方文明断层线等问题，也需要另文解释。本文实际上立足于一个判断：继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 2014 年开始的对乌克兰政策使得俄罗斯地理空间跨过了又一个历史节点，它的影响将在未来表现出来。历史将对此作出验证。

（责任编辑 聂保诚）

① 这实际上也包括苏联解体。